

插图本

中国民间文学史

高有鹏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插图本

中国民间文学史

高有鹏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插图本中国民间文学史/高有鹏著.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1. 8

ISBN 7-81041-874-2

I. 插… II. 高… III. 民间文学 - 文学史 - 中国
IV. I20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4481 号

责任编辑: 袁喜生 王 芸

责任校对: 何晓林

装帧设计: 王四朋

出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475001)

0378-2865100

发行: 河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版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650 千字

印张: 37.25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48.00 元

序：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民间文学史

民间文学一般称为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它是针对在漫长的社会发展中那些体现个人意志并以个人名义公开（出版、发表）于世的人文现象而提出来的，它们之间的对比就如同人们通常所用的两个成语，一个是下里巴人的艺术创作，另一个则是阳春白雪。封建士大夫蔑视民间文学，冠之以“俗”，认为它不登大雅之堂。这在事实上构成了一种强大的文化传统。当然，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对民间文学给予高度评价，而且这些人还都是优秀的作家和学者，但他们毕竟没有取得文坛的统治权，没有形成主导力量，像屈原、李白、杜甫、刘禹锡、李梦阳、李调元、曹雪芹等，他们许多人在社会上是不为统治者所容的，颠沛流离，名在千秋而不达于世。这也体现出一种文学规律，即优秀的作家，总是与人民保持着血肉相连的联系，总是关注着民间文学这一文化现象。这种情况不独在我国有，从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到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所有的文学巨匠都与民间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高尔基强调指出，“如果不知道人民的口头创作，那就不可能懂得劳动人民的真正历史”，因而也就不会成为优秀的作家^①。当然，民间文学毕竟不同于作家文学，也不同于通俗文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情感表达方式与审美表现方式。

只有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认识民间文学，才能更全面准确地把握其发展规律及其实质、价值与意义。

中国民间文学的保存，一般以为有三种形式，即文献的、文物的、口头的。这三者我们应该看做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尤其不能忽视文献的内容。由于

^① 高尔基《苏联的文学》，新文艺出版社 1953 年版。

历史的原因,我国古代典籍中对民间文学的记录多出自封建文人之手,除了认识上的狭隘及有妄作改纂的现象外,更多的是支离破碎,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大致的内容。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摒弃它,而且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民间文学,还必须以古代典籍的材料为主要依据,它是我们必备的参照系。

古代典籍对民间文学的记载因人因时而异,有的仅仅提及很少的片断,诸如一些史书和仪典,像司马迁的《史记》曾提到“大楚兴,陈胜王”那样的歌谣;有的保留得稍多一些,诸如诸子著作和后世的一些笔记、方志,但较多的是作为文人的论据,仍然缺乏自觉的态度;保存民间文学内容较多的典籍情况也不尽一样,如《诗经》中保存较多,《尚书》、《易经》中去掉一些卜语也可看到一些歌谣,而《山海经》、《淮南子》、《搜神记》、《神异记》、《乐府诗集》、《太平广记》、《路史·后记》、《帝王世纪》等典籍就不同了,越往后世,专门记述民间文学作品的就越多。明清之后形成了关注民间文学的思潮和传统,民国之后就完全用白话记述,使民间文学保持了原汁原味,如五四歌谣学运动中的《歌谣周刊》,甚至影响到整个白话文运动、新文学运动,更不用说新中国成立后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了。

从文献上去钩沉、整理民间文学是一项十分艰辛的工作,任何一位学者都难以穷尽它,这只能努力开拓,更多地是要靠按图索骥,尽量挑选到典型的内容,勾勒出基本轮廓,理出其嬗变轨迹及其发生背景。

民间文学在古代典籍中的保存与作家文学有着显著不同。作家的存在依赖于具体的文学作品,而这些作品作为文本的存在一般是固定不变的;即使有变化,那也是少量的版本上的差别,而且相当有限。最为著名的如《西厢记》有“董西厢”、“王西厢”等差别,《水浒传》版本更多,《红楼梦》还有许多续书。这在今天还牵涉到著作权保护问题,若有大量抄袭、剽窃,就会受到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制约。民间文学的生命恰恰就在于类似内容的传播,其匿名性特征与作家文学的著作权观念形成鲜明对照——民间文学的传播过程,既是其存在基础,又是其创作过程。民间文学的归属权属于人民大众,它虽然没有著作人姓名,但任何人也不敢随意据为己有。它的艺术魅力是无穷的,被那些有识之士称作“天籁”、“国风”。民间文学的经典作品是一代又一代人民大众共同创造的,它的记录、整理,在今天成为我们必不可少的研究依据。它的版本形成是相当复杂的,几乎同一类作品在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地区都是不同的。如著名的四大民间传说《牛郎织女》、《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它们的发生过程、嬗变轨迹就是一个典型。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史的角度来描述这种现象呢?千百年来,这些民间传说的传播经久不息,我们只能

从一个方面去记述它。在这一方面，鲁迅先生是我们的榜样，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著作在方法上为我们做出了表率。我们论述民间文学史不仅要看到它的影响面，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它的原型形成和变化过程，选取典型的内容进行考察、分析。事实上，我们的民间文学史写作就是为他人提供一个尽可能准确的路标。

民间文学的发生与记述并不是完全对等对应的。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丰富的民间文学，而被记述的民间文学作品则是极其有限的。历史上这样的事例很多，它告诉我们，写作民间文学史不能仅仅看它被记述的时代，更重要的是从它的具体内容上去分析研究。如盘古神话问题，它的记录，最直接的材料是三国时吴人徐整的《三五历纪》和《五运历年纪》，而这两部著作后来也散逸，只零星存在于其他一些典籍中。那么是否在三国时代才有盘古神话的发生与流传呢？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从其内容来看，它应该是我国最为古老的神话，因为从世界上许多古老神话来看，只有描述天地起源的神话才是产生时代最早的^①，许多民间故事更是这样。这种现象在民间歌谣中更为突出，如《伊耆氏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它见于《礼记》，而在《山海经》和一些甲骨卜辞中也能见到类似内容^②。再如《弹歌》和《昔葛天氏之作乐》见诸《吕氏春秋》等文献，其产生时代可以有充分的理由判断为原始时代。这就是说，我们离不开古代典籍的文献材料，更离不开结合作品的实际内容去写作民间文学史。当然，我们首先要依据文献，其次才是具体的判断分析。

在古代典籍中还有这样一种现象，关于同一个历史人物或事件，在不同的典籍中记述的具体内容相异。如鲧禹治水神话，《山海经·海内经》中有“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的记载；而在《国语·晋语八》中，则记为“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在《楚辞·天问》中有“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化为黄熊，巫何活焉？洪泉极深，何以填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应龙何画？河海何历”等一系列发问；在《淮南子·墮形训》中又有“凡鸿水渊薮，自三百仞以上，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渊。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的记述；另见《汉书·武帝本纪》龙师古注引《淮南子》，今无；又

① 参见《世界各民族神话大观》，[苏]梅列金斯基等著，魏庆征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3 年版。

② 参见郭沫若《卜辞通纂》，《郭沫若全集》，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见《绎史》十二引《随巢子》等,都有类似内容,还加入“禹治鸿水,通轩辕山化为熊”而“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的情节。这就要求我们在“史”的描述形式上会聚尽可能详备的典籍来整体把握民间文学某系统,并勾勒出各种民间文学作品之间的复杂联系。

中国文化典籍浩如烟海,靠任何个人都难以通览,但关于民间文学的典籍我们是可择其要而完成总体把握的,当然,这绝非一时片刻所能奏效。民间文学的典籍整理工作现在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果,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可喜的方便,使我们得以在前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新文化运动以来,结束了民间文学无单体史、通史的局面,特别在相关的古籍整理、文献材料的钩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如钱南扬关于谜史的研究,袁珂等人关于神话史的研究,刘守华等人关于故事史的研究,张紫晨关于歌谣史的研究,潜明滋关于史诗史的研究等,特别是顾颉刚等人关于孟姜女故事的研究,罗应麟关于白蛇传故事的研究等,这些学者通过艰辛的努力,为我们汇总了相关的文献材料。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袁珂先生对古代神话的文献整理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可以说,我们在此基础上已经具备了相当充分的中国神话史的著述条件(袁珂先生本人已出版《中国神话史》)。靠几代人的努力,我们终于迎来了这样一个可以借助充足的文献写作民间文学史的时代。

二

文物的史学意义主要表现在它以实物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了历史的原貌,考古的方法在事实上就是面对历史的遗留物所进行的一种异常艰辛、复杂的鉴别。在通常的意义上,文物的概念我们多局限于出土的实物,而那些存留在民间的物品和典籍中的图片这种丰富的有形物品则不被重视。民间文学的存在方式是多元的,文物是一种具体的民间文学观念的体现——它以直接的、生动的典型形象映现出一定的审美观、价值观、人生观,无论是书面语言还是口头语言的描述,都无法替代这种特殊的效果。

民间文学的文物表现为这样一些基本形式:

1. 出土文物。主要包括一些器皿花纹或实物具形(有些系民间文学作品情节的图绘,有些系民间文学人物或动物的形象典型),多集中在墓葬的发掘。这也是考古工作的重点。

2. 岩画。它主要集中在相对偏僻的山区或边区,最为典型的如连云港将军崖岩画、内蒙古阴山岩画(图001)、云南沧源崖岩画等。这应该是最原始的

记录。

3. 民间木刻、版画、编织、装饰等图案和古玩。其典型体现为具有规模意义的制作,如天津杨柳青、浙江桃花坞、河南朱仙镇等传统版画。这些作品色彩鲜艳,造型突出,使民间文学的具体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世人眼前。这部分文物最为丰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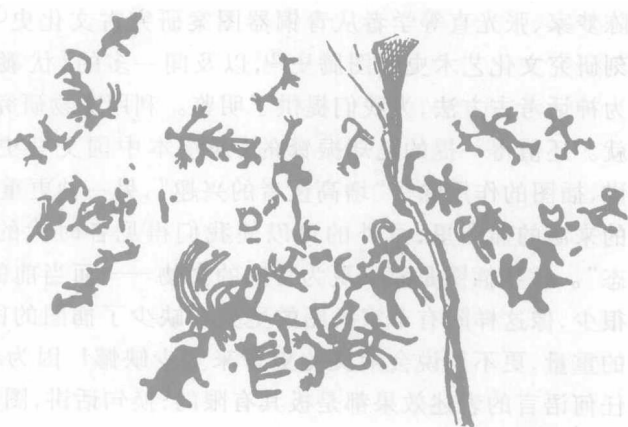


图 001 内蒙古阴山岩画中的原始群舞图

4. 壁画。它通常选取一些传说故事的片断或系列,而且较多地与宗教艺术掺杂在一起。诸如敦煌壁画和神庙中的水陆道场画等,以洞窟、宫殿为存在背景,场面相对广阔,给人以全景式的展现。

文物是无言的故事,它不仅是民间文学的载体,更重要的是它还体现出民间文学的存在环境及其具体的功能。许多文物所表现的民间文学内容并不仅仅为了记载一定的传说故事或歌谣、戏曲,而是服务于一定的节庆、仪式等社会性的生活需要,具有实用性特征。诸如汉画像石中的神话情景,是古人为逝者设置的美好、理想的天国,表达衷心的希望和祝愿;古庙会上的古玩具,像布老虎、泥泥狗等物品是服务于雉的内容,即驱邪、避灾、逐疫、纳祥;民间剪纸更是为了突出喜庆的内容,而且包含着求子(高媒)和图腾等古老的信仰。但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它们在事实上保存了具体形象的民间文学的艺术图案,成为我们认识和理解民间文学的感性材料,同样是我们写作民间文学史不可忽视的内容。这是物具化的民间文学,千百年来,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我们的历史发展,作用于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具体形成。在这些文物中,有许多异常珍贵的文化遗产,将它们的具体内容与古代典籍文献材料相结合来看,一些复杂的问题会迎刃而解。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这一方面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和贡献,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论著即是利用文物材料研究历史,成为“新史学的开山”。鲁迅治文学史,念念不忘请人帮助收集汉画像石资料,

陈梦家、张光直等学者从青铜器图案研究古文化史^①,常任侠、孙作云通过石刻研究文化艺术史和图腾史^②,以及闻一多的《伏羲考》^③等被后世学者概括为神话考古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明鉴。利用文物研究文化,是新史学的重要成就。还值得一提的是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④,如他在“例言”中所讲,插图的作用除了“增高读者的兴趣”,另一种更重要的原因是“在那些可靠的来源的插图里,意外的可以使我们得见各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的的生活的情态”。这些插图是意义更为特殊的文物——而当前的民间文学史著在数量上很少,像这样附有丰富插图的更少。缺少了插图的民间文学史将失去它应有的重量,更不用说会给文化史带来多少缺憾!因为相对于实物(图案)而言,任何语言的表述效果都是极其有限的;换句话讲,图案的显示效果是任何语言都难以替代的。

三

民间文学史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史,如果仅仅局限于古代典籍,除了给人以支离破碎的印象外,它将失去自己的学术生命。典籍作为文献是有限的,而以口头的形式仍然存在于民间的民间文学是无限的——尽管我们必须以文献为基本线索去认识民间文学的嬗变轨迹。在这一方面,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口述史学、民俗学等学科已经有成功的范例为我们提供出借鉴,尤其是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口述史学实践的成功经验应该为我们所重视^⑤。它告诉我们,文献的历史是极其有限的,口述的历史更趋于完整和真实。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进程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一方法的科学性。特别是近年来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四大发现的“中原神话、纳西族祭天古歌、沧源岩画、防风神话”^⑥,几乎都是以口述史学的基本方法为线索,发掘出来的。更不用说当前刚刚结束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大集成》在事实上就是口述史学的一种自觉实践,田野作业的科学考察方法成为我国民间文艺学事业开拓、发展的最为有效的手段。

① 参见《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 1983 年版。

② 参见《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孙作云《中国古代的灵石崇拜》,《民族杂志》1937 年五卷一期。

③ 《闻一多全集》(一),三联书店 1982 年版。

④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⑤ 参见杨雁斌《口述史学面面观》,《国外社会科学》1994 年第 6 期。

⑥ 《文汇报读书周报》1998 年 6 月 13 日载文。

诚如胡适在 20 年代面对北大歌谣研究会收集的歌谣所感叹的那样，“有了这些新史料作根据，我的文学史自然不能不彻底修改了一遍了”^①。

口述的记录整理取得成就最为显著的当数中原神话和我国少数民族史诗。前者被著名学者钟敬文称为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②，后者显示出我国民族民间文学的灿烂无比，它们用铁的事实表明中华民族卓越的聪明才智及其所创造的文明是整个世界文化不可忽视和不可缺少的一页。同样，文学史缺少了这些内容而不加修改与补充，那就是不折不扣的迂腐和孱弱，因为它失去了异常珍贵的内容而形成严重的残缺与失重。

神话的概念是近代由蒋观云第一次提出的，而它在原始社会就存在而且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国际上一些别有用心的学者如英国的威登等殖民主义分子，大肆叫嚣“中国人缺乏创造神话的智慧”^③。30 年代，我国神话学取得重要进展，闻一多等学者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掘出许多珍贵的神话，但这对于反击威登之流的妄言、证明中华民族神话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仍然缺乏有力的证据。到了 80 年代，以张振犁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中原这一号称民族重要发祥地的区域同样发掘出丰富的神话群，这就从根本上推翻了国内外所有不切合实际的“中国神话残缺论”、“中国神话匮乏论”等滥调。难怪中国现代民俗学家钟敬文非常激动地给予其高度评价！

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文学蕴藏最为丰富的是史诗和歌谣；特别是民族史诗，它具有非凡的意义和价值。闻名世界的三大英雄史诗——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都是长期在民间以口头形式流传而成为民族神圣的经典的。其他还有蒙古族的《勇士谷诺干》、《喜热图莫尔根汗》、达斡尔族的《阿拉坦噶乐布尔特》、赫哲族《满斗莫日根》、《什尔大鲁莫日根》、《大竹林》、维吾尔族的《乌古斯传》、柯尔克孜族的《英雄扎西吐克》、哈萨克族的《英雄托斯提克》、乌孜别克族的《阿勒帕米西》、彝族的《梅葛》、《查姆》、《勒俄特依》、《阿细的先基》、哈尼族的《奥色秘色》、佤族的《西岗里》、纳西族的《崇班图》（《创世纪》）、《黑白战争》、《哈斯战争》、白族的《开天辟地》、拉祜族的《牡帕密帕》、景颇族的《遮米麻和遮帕麻》、土家族的《摆手歌》、独龙族的《创世纪》、壮族的《姆六甲》、《布洛陀》、《布伯》、《郎正

① 《白话文学史》，岳麓书社 1986 年版“绪言”部分。

② 《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序”，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 年版。

③ 参见马昌仪《人类学派与中国近代神话学》，《民间文艺集刊》第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年版。

射日》、布依族的《赛胡细妹造人烟》、《造万物歌》、《十二个太阳》、侗族的《祖源》、《祖先落寨歌》、黎族的《姐弟》、水族的《开天立地》、傣族的《变扎戛帕》、苗族的《古歌》、瑶族的《密洛陀》、畲族的《高皇歌》等等。这些史诗的保存都是以口传为主要形式,有的由专业歌手演唱,有的成为巫覡的经书,它们或以整齐的歌句组成,或以说唱为主要形式,千姿百态,在民族文化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崇高的地位。这些史诗一般容量丰富,有宏大的跨度,可称为各个民族的百科全书;其想象奇特,手法多样,集古老的神话和优美的歌句为一体,堪称世界文化的瑰宝。这些史诗的发现,又大都依据各个民族的口传——没有口头的作品整理,这些瑰宝将一直为尘封埃锁。民间文学的实质性特征也正在于口头性。关注到这一特征就意味着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让我们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民间文学史的写作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不仅仅要描写论述阐释某种民间文学作品的存在及其意义和价值,还要指出其具体状态的历史条件和生活背景。也就是说,民间文学不是单纯的个体存在,而是融注进民间文化的整体之中,时刻为人民所运用;同时,它在具体形成和发展变化中,常常同作家文学等人文现象发生复杂的联系,又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特征,从而共同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精神世界。这里最为复杂的就是民间文学普遍同民间信仰发生密切联系,而民间信仰又具体同图腾、宗教等内容相融合。揭示出这些内容的具体成因,同样是民间文学史不应该回避的方面。民间文学归根到底是属于人民大众,为人民大众所创作和运用的,它既有历史的积淀,又有鲜明的时代性。从宏观来看,民间文学在历史的长河中作为民间文化,同人文文化共处于一个空间。

再者是民间文学史还应该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个是搜集整理和改旧编新,一个是不同时代的民间文学观。前者从我国文学史上可以相当普遍地看到,诸如魏晋时代干宝的《搜神记》等志怪小说、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等笔记小说,以及明清时期冯梦龙、李调元和蒲松龄等人的作品,不时闪烁着民间文学的奇彩。但这些作品虽然保存了一些民间文学作品,却并不是纯粹的民间文学,它们包含着作者的审美评判、道德观念。后者是一些学者在注疏、论述、引用一些民间文学作品时表现出来的学术观念即民间文学观,从古至今构成了一部容纳百家的民间文学(化)思想史,这是中国文化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屈原的神话观、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论到近世王国维、鲁迅、茅盾、胡适、瞿秋白、毛泽东、顾颉刚、刘半农、钟敬文、江绍原等不同身份的人物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民间文学观,这同样是民间文学史应该注意的内容。

在迈进新世纪的今天,民间文学史的写作不论是资料搜集上还是写作手段的运用上,都面临着可喜的机遇。特别是前一个世纪的现代民间文艺学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我们有了前人铺下的基石,也有了新的利器,可以冷静地把握历史,进行理性的分析、审视和总结——尤其是为了更多的人和未来的人更完整更便利地理解民间文学的历史,现在,我们应该,也能够去写出多种多样的民间文学史——让前人能够欣慰于这项工作终于得以完成,让后人能站立在我们的肩头,望得更远!

目 录

序: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民间文学史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中国神话时代	(18)
一 盘古时代	(22)
二 女娲时代	(26)
三 伏羲时代	(29)
四 炎帝神农时代	(32)
五 黄帝时代	(36)
(一)战争神话	(39)
(二)治世神话	(42)
(三)发明创造神话	(44)
六 颛顼帝喾时代	(47)
七 尧舜时代	(51)
八 大禹时代	(59)
第三章 远古歌谣	(73)
一 《周易》是远古歌谣的集成	(75)
二 远古歌谣和神话一样依赖记忆和口述才能长期传承和广泛传播	(80)
第四章 商周时代的传说、故事和歌谣	(85)
一 历史著作中的民间传说	(86)
二 诸子著作中的民间传说	(95)
三 商周时代的民间故事	(101)
四 商周时代的民间歌谣	(110)
(一)先秦典籍对商周时代民间歌谣的保存	(110)

(二)《诗经》与《楚辞》、楚歌	(118)
1.《诗经》中的民间歌谣	(118)
2.《楚辞》与楚地民歌	(129)
第五章 秦汉间俗说	(137)
一 乐府民歌	(142)
二 史传文学中的民间文学	(158)
三 个人著述与民间文学	(167)
(一)刘向与民间文学	(167)
(二)刘安与民间文学	(173)
(三)应劭与民间文学	(179)
(四)王充的《论衡》及其民间文学观	(182)
四 典籍注释与民间文学	(191)
五 纬书中的民间文学	(198)
六 神庙与石刻中的民间文学	(205)
七 民间戏曲是后世戏剧文学的重要源头	(209)
第六章 魏晋风度	(214)
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	(215)
(一)《山海经》遗音	(216)
(二)《搜神记》、《世说新语》及其他	(231)
1.鬼之董狐:干宝的《搜神记》	(232)
2.清言渊薮:刘义庆小说中的民间传说故事	(237)
3.《水经注》与民间传说	(245)
4.《后汉书》与《荆楚岁时记》	(252)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歌谣和谚语	(260)
(一)魏晋歌谣的时政意识	(261)
(二)南朝乐府民歌	(265)
1.吴声歌曲	(266)
2.西曲歌	(269)
3.神弦歌	(273)
(三)北朝乐府民歌	(275)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谚语的保存	(282)
第七章 隋唐新声	(287)
一 隋代民间文学的创新	(287)

二 唐代民间文学的发展	(296)
(一)《大唐西域记》	(300)
(二)《酉阳杂俎》和唐代民间传说故事的保存	(310)
(三)敦煌变文与曲子词	(326)
1. 敦煌变文	(327)
(1)佛变	(328)
(2)俗变	(333)
2. 敦煌曲子词	(340)
(四)唐传奇与民间文学	(354)
(五)诗中的神话与传说	(365)
(六)诗妖:民间歌谣与谚语	(379)
第八章 清明上河图:宋代民间文学的大繁荣	(391)
一 宋代民间歌谣和谚语	(395)
二 《突厥语大词典》与《福乐智慧》	(405)
三 笔记小说与民间传说故事	(412)
四 宋代的“说话”与民间文学	(428)
五 宋代民间戏曲	(442)
第九章 “石人一只眼”:元代民间文学	(454)
一 元杂剧与民间文学	(455)
二 “说话”与笔记中的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	(460)
第十章 天机自动:明代民间文学	(474)
一 民歌和民间叙事诗	(475)
二 别具特色的明代民间谚语	(488)
三 明代民间传说与民间故事	(495)
(一)传奇小说与笔记中的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	(499)
(二)历史传奇与历史传说	(506)
(三)民间笑话和寓言故事	(513)
第十一章 最后一声叹息:清代民间文学	(519)
一 民间歌谣和谚语	(520)
(一)民间情歌	(521)
(二)民间儿童歌谣	(528)
(三)方志文献中的民间歌谣与谚语	(535)
二 清代民间长诗与少数民族歌谣集	(542)

(一) 民间长诗	(542)
(二) 少数民族歌谣集《盘王歌》	(545)
三 清代民间弹词与鼓词	(549)
四 清代民间传说与民间故事的多元构成	(558)
(一) 新旧传说的交织与并存	(559)
(二) 清代民间故事	(570)
(三) 民间笑话和民间寓言	(577)
后记	(581)

第一章 绪论

中国民间文学史面对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典籍文献与民间口头传播、文物实证的问题,一是如何处理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共有的民间文学问题。只有把这两个问题处理好,中国民间文学史才具有更高的科学意义;忽视了这两个问题的处理,无疑是一种明显的缺憾。令人欣喜的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已经为这两个问题的处理积累了经验,使我们能够汲取其成果,借以做出更充分的努力,使人们对于中国民间文学有一个更为完整、更为清晰的认识。前一个问题的处理,我们更多地从两个领域来获取经验,即古典文学的深入研究与民间文艺学的拓展;后一个问题,我们更多地得益于方兴未艾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有机地将各方面成功的经验进行系统的归纳并融入中国民间文学史的著述之中,勾勒出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是本书的光荣使命。

中国民间文学史的写作,离不开对古典文学研究成果的吸收。古典文学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包括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所创作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书面文学,而且包括千百年来为人们所喜爱的民间口头文学。但是,由于我国有过漫长的封建专制的历史进程,民间文学一直受到压抑和贬斥,只有少数有识之士正视其价值和作用,所以它的身影更多地处于偏裨之列。这种状况在晚清时期渐被打破,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就更进一步受到冲荡,先有胡适撰写的《白话文学史》,后有郑振铎撰写的《中国俗文学史》,再后来就是以古典文化为基本背景的文学整体研究中对民间文学的重视。这主要表现在考据、辨析方面,民间文学作为古典文学的一部分,其存在状态和价值、意义被清理、发掘了出来。尤其是20世纪的文化背景中融入了传自域外的新史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方法的介绍,与传统的义理、辞章、考据的研究方法相结合,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逐渐得到公正的评价。这为我们认识古典意义上的民间文学的发生、嬗变及与其他文化艺